

严复与复旦公学*

张 仲民

摘要：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严复的四篇佚文等相关新资料，对严复在任复旦公学监督时的情形，特别是就他与复旦公学职工叶仲裕等人发生的冲突进行了考察，重新梳理和辨析了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希望藉此能纠正以往严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亦能弥补复旦大学校史记载和研究中的空白；进而还可为严复的若干信函及行迹考订时间。

关键词：严复；复旦公学监督；叶仲裕

在已往关于严复的研究中，有一些著述涉及到了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问题¹，但这些著作（也包括很多学者所编的严复年谱、年表，乃至复旦大学的校史）对严复任职复旦的情况及辞去复旦公学监督的具体原因，皆语焉不详；对严复信函和行迹的日期也未加详细考辨，有不少的误用、误引。笔者这里根据新发现的四篇严复佚文，以及有关严复在复旦公学任监督时的相关资料，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来重新审视严复与复旦公学的关系。²希望藉此能纠正以往严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亦能弥补复旦大学校史记载和研究中的空白；进而还可为严复的若干信函及行迹考订时间。

* 本文曾刊《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唯杂志篇幅关系，不得不做了较大幅度的删减，此处发表的是完整版并增加了一些新材料，删除了一处原来判断不够准确的注释。本文蒙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周武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马忠文教授、中研院近史所黄克武教授指点与斧正。在此一并致谢。

¹ 如冯保善：《严复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127-131页；皮后锋：《严复的教育生涯》，《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第54-62页；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213-220页；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9-286页；等等。

² 在王栻先生主编之《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五卷本基础上，学界关于严复佚文之收集整理，集大成者为孙应祥、皮后锋两先生所编之《〈严复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关于严复一生行迹，考订较为精审者，当属孙应祥先生所编《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惟以上两书亦存有一些疏漏之处。如谈到严复1906年8月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报》上发表的《述黑格儿唯心论》一文，“是我国最早介绍黑格尔哲学的文章”（参看《严复年谱》，第284—285页），此判断就为误。事实上，在严复之前，介绍黑格尔的中国人已经很多，最著名的当属于《新民丛报》第27号（1903年3月12日）上发表的马君武的《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一文，比此文更早一点的还有《大陆报》第1期（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第5—7页）上发表的《德意志六十哲学家列传·黑格尔传》等。

一 就职

我们先从严复与复旦公学最早的关系说起。1905年3月，因震旦学院内部发生权力倾轧，马相伯（1840—1939）被迫带领部分学生从震旦脱离，另立“华人自主之学校”——吴淞复旦公学。³立校伊始，马相伯请包括北洋旧交严复在内的二十八位名流担任复旦公学校董，以便让他们为学校募集资金，提高学校声望，并能参与到复旦校务的管理。随后，一份由严复居首署名的二十八位复旦校董发出《复旦公学集捐公启》，为复旦建造新校舍募捐。⁴而据当时《时报》、《中外日报》等报刊上刊载的《复旦公学广告》还可知，严复与马相伯一起也为复旦“评定”了教授法、管理法，“本学教授法、管理法由严几道、马相伯两先生详定；并请校董熊季廉、袁观澜两先生分任管理之责。”⁵严复还和马相伯共同主持了复旦公学的招生考试，以补录四十名新生。⁶这期间，还曾有不少人建议由严复担任复旦公学“总教”，可严复担心“主意人太多，恐力不下”，故辞而不受。⁷严复这时还从落实办学经费方面考虑，为复旦拟定了复旦公学管理办法、课程即《复旦公学章程》文件，尽管严复担心章程未必“切于事情”，只能“备发起诸公采择损益而已”，可他还是认真负责，感觉“须作到如此，方为正办。”⁸1905年9月，复旦校舍修竣，于14日下午两点正式开学；开学当天，校董萨鼎铭还请来军乐队助兴。⁹14日下午，一批名流登台演说，严复也以校董身份厕身其间。¹⁰

这一时期，严复还不断与身为复旦校董、担任管理该校之责的得意门生熊季廉（元锷）通信，但由于熊本有病，又“为复旦公学及往日本调查铁路事所累”，不幸于1906年4月下旬病逝。严复于4月28日到上海颐园参加了复旦公学、青年会为熊季廉召开的追悼会，并送挽联，包括郑孝

³ 关于这些学生脱离震旦的原因及马相伯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时人在不同角度有较详细的记载，可参看《震旦学院解散记》，《中外日报》1905年3月10日，第一版；《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大陆报》第3年第3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纪事”，第1页，已收入《复旦大学百年志》编辑委员会：《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4页，唯《复旦大学百年志》所列《大陆报》出版日期有误。

⁴ 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1—53页。原件见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复旦大学集捐公启》小册子，目录号ZH0101—1，案卷号0001。

⁵ 《时报》1905年7月22日，第一张第一页；此广告亦见《中外日报》1905年7月25日，论前广告第一版。这些广告在报纸上都是多日重复刊登的，下同。

⁶ 《复旦公学广告》，《时报》1905年8月21日，第一张第一页；此广告又见《中外日报》1905年8月24日，论前广告第一版。

⁷ 与《长子严璩书》（二）（1905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781页。

⁸ 《与熊季廉书》（三十一）（1905年7月），孙应祥、皮后锋：《〈严复集〉补编》，第256页。此章程到夏敬观任复旦监督时进行了更改，参看《本署司详复厘定复旦公学章程文》，《江宁学务杂志》己酉十月十五日（1909年11月27日）第8期，“公牍”，第3-6页。

⁹ 《复旦公学开学广告》，《时报》1905年9月10日，第一张第一页；《复旦公学广告》，《中外日报》1905年9月14日，广告第一版。

¹⁰ 《复旦公学广告》，《时报》1905年9月14日，第一张第一页。

胥等与会者大约有 200 余人。¹¹严复随后还写信给熊季廉之弟季贞，解释熊季廉为复旦事所累情形，其中言：“又复旦公学去年为索观澜侵蚀公款至数千金，反以此为学生罪，天下不平无过此者。季廉知之，故在日力以维持复旦为己任。”¹²在该信里，严复还对复旦的人事变动做了评述，并认为原监督马相伯“老不晓事，为人傀儡”，已经辞职，复旦公学大局岌岌可危，只是复旦学生在学长带领下，“幸团体尚坚，未即分散”，他们迫切希望能“得贤为之校董”。严复与郑孝胥、张元济在 7 月 19 日晚还往愚园赴陈三立（伯严）之约，商讨维持复旦公学的事情；会议参加者还包括复旦学生代表叶仲裕（景莱）（1879—1909）等人。¹³经过与会诸人的努力，特别是依赖陈三立的奔走，“为筹维持之术，既资以款，复为之解纷，使齟齬者无，遂至（止）于冲突。”¹⁴严复这里还乐观相信，从此以后，复旦公学“当不至离散也”。需要说明的是，复旦这时得到的款项是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周馥通过“扬州运使”划拨给复旦的二千两银子，“银二千两，乃南洋协助复旦公学之款。”¹⁵饶是如此，复旦公学还是发生了一些变故，“刻因复旦公学事急”，让严复颇感突然，身在安庆的他不得不改变原本要去庐州的计划，由安庆直接去南京斡旋，耽搁五六日后再返沪。¹⁶

1901 年新政后，特别是科举制在 1905 年 9 月被废除、学部在同年 12 月成立以后，新式学堂日益成为区分一个地方文明与否以及衡量地方官员政绩和“进步”的标志。在此背景下，清末社会掀起办学热潮，有办学经验或懂教育的人才炙手可热，一批趋新的社会名流首当其冲，许多都被聘为监督或校长，像吴汝伦、蔡元培、张元济、严复等人；有的则亲自办学，如马相伯、孙诒让等。不言而喻，一个好的校长对于一个学校意义重大，他不仅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权势网络为学校争取足够的办学资金等资源，还可以依靠自己的声望为学校聘请好的教师与招来好的学生，所谓“学堂之进步，端赖师资；监督一席，关系綦重”¹⁷。校长良莠与否，对于在经费上捉襟见肘

¹¹ 参看孙应祥：《严复年谱》，第 271—272 页；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040 页。

¹² 《与熊季贞书》（1906 年 7 月 20 日），收入《〈严复集〉补编》，第 276 页。

¹³ 《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049 页。叶仲裕大概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接任袁希涛（观澜）担任复旦公学庶务长。参看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历任教职员一览表》，目录号 ZH0102—1，案卷号 0010，第 8 页。必须说明的是，这份档案所收教职员名单并不完整，且各教职员任职时间也不尽准确。

¹⁴ 《与熊季贞书》（1906 年 8 月 5 日），收入《〈严复集〉补编》，第 278 页。标点略有更动。

¹⁵ 参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050 页。郑孝胥记此事在 1906 年 7 月 23 日日记，此时端方还未就任江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此两千元经费应该是由马相伯在 1905 年冬向江督周馥申请得来，“先生复请于江督，月拨经常费二千元，于是复旦公学之基础始固。”（参看张若谷编：《马相伯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67 辑，第 664 种，台北：台海出版社影印本，第 215 页。）然此经费并没有正常化，况且得到此拨款时马相伯已经离任复旦监督。年谱作者张若谷有些夸大马的作用，但也说明此款非得自端方。

¹⁶ 《与夫人朱明丽书》（二）（1906 年 9 月 20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735 页。郑孝胥 1906 年 10 月 5 日记载：“张躔五来言复旦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059 页。此处张躔五（即张桂辛）所言事与让严复改变行程的复旦事或有关联。

¹⁷ 《江督照会郑京卿孝胥为中国公学监督文》，《江宁学务杂志》丁未年三月十五日（1907 年 4 月 27 日）

的复旦公学这样的私立学校尤为重要。马相伯既不堪重负而辞职，那么寻找新的、合适的公学校长自然迫在眉睫。

在当时往往人去政息的情况下，周馥给复旦的拨款，继任江督就不一定会继续划拨。而此时周馥已经离任，新的两江总督由端方（1861—1911）接任（1906年9月到任，1909年初调任直隶总督）。¹⁸端方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主张改革，“锐意新政，所至以兴学为急。”¹⁹有此东风，复旦公学干事员叶仲裕（叶景莱）、张桂辛等人希望端方能延续周馥的政策，给复旦拨款。在丙午冬（大概在1906年12月—1907年1月间），他们正式向端方提出申请，请求让与复旦有深厚关系的严复担任监督，并能为复旦拨款、添聘教习。²⁰

据严复的“夫子自道”，端方对严复非常赏识与尊重，屡屡接见，还想让其子拜严复为师，甚至自己也想拜严复为师。²¹故由严复继任复旦公学监督，在端方这里并无问题，且他只需要做个顺水人情而已。严复于12月6日早晨在南京首次会见了端方，他与端方商谈了担任复旦公学监督的条件——“复旦公学须得彼提倡，肯助开头及后此常经费，吾乃肯为彼中校长。”²²端方该是痛快地答应了严复的条件，因为不久，在1907年1月14日（农历十二月初一），时任上海道的瑞澂（瑞莘儒）就拨给复旦两千多两银子，严复以复旦名义接受并在报上刊登谢函。²³这个拨款应该是出自端方授意，是端方满足严复的任职要求之举。

由严复接任监督，达到了复旦公学学生的预期要求，如严复1906年11月29日在写给其外

第1册，“公牍”，第2页。

¹⁸ 参看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01—1503页。

¹⁹ 吴庆坻：《端总督传》，收入端方：《端忠敏公奏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第94种，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8页。

²⁰ 关于《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折》，《端忠敏公奏稿》编者将该折时间列为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但该折也曾出现在《江宁学务杂志》第5期（丁未年七月十五日[1907年8月23日]）、《四川教育官报》丁未第9册（1907年10月）上刊载，折中言及“本部堂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1907年6月8日）会同江苏巡抚部院陈恭折专差具”，又言叶仲裕、张桂辛的禀请是在“本年二月”。（《督宪端札筹拨复旦公学常经费，谨陈办理情形一折文》，《江宁学务杂志》第5期，“公牍”，第5、6页。）笔者根据《叶景莱启事》：“自丙午冬，景莱与张君桂辛赴宁禀请拨定复旦常经费后”云云，则《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折》所言可能不准确。因该折肯定系端方幕僚所写，其所言的具体日期不如叶景莱所记准确。且从上奏到得到批准，一般都要稽延一段时日，很可能“本年二月”是端方批准叶、张禀请的时间；另外，严复也说：“自丁未春，经两江督宪奏拨常经费、派定监督之后，（复旦）已成官立之校。”《严复启事》，《时报》1908年2月12日，第一张广告版。因之，这里采用叶景莱的说法，为“丙午冬”，参看《叶景莱启事》，《申报》1908年2月10日，第一张第一版。另外，据叶瀚所言，是“陈三立感景莱等之苦志”，遂向江督端方请求拨“助校费岁二万金”的（参看叶瀚：《叶景莱行略》（续），《神州日报》1909年11月27日，第四页）。据此，很可能是陈三立先代叶景莱在端方那里作了疏通，然后叶景莱等人再提出拨款请求的。

²¹ 《与甥女何纫兰书》（八）（1906年12月6日），《严复集》（第3册），第832页。

²² 《与甥女何纫兰书》（八），《严复集》（第3册），第832页。

²³ 参看《复旦公学广告》：“本月初一，蒙关道宪瑞莘儒观察筹拨银式千两余。复呈收据外，敬登报鸣谢。”《时报》1907年1月17日，第一张广告版。此短文亦未被收入《严复集》及《严复集》补编中。

甥女何纫兰的信中所言：“本日复旦诸生以书恳我为之校长，经诺之矣，不识能兼顾否？”²⁴表明严复任监督是先受到复旦公学学生的吁请。而稍后在《中外日报》、《时报》上刊出的《复旦公学广告》，也可作为严复之言的注脚：

本校向经前校长丹徒马相伯先生管理，嗣以事繁告辞。客岁冬（即1906年冬），公举代表稟谒江苏督宪。蒙端制军力任维持，特为延聘侯官严几道先生来任校长。伏维此校前承热心学界诸公发起以来，其间伫苦停辛，仅克虜立。全体同学，矢慎矢勤，唯恐陨越，为学界羞，又一年于兹矣。今幸为鸿硕不弃，将提挈而振董之，予以竞前者马先生、发起诸公之美志。全校同人倍深感奋，海内留心教育者，倘亦深所乐闻，一共邪许也欤？谨此布告，伏乞公鉴。²⁵

综合以上情况可知，严复接任复旦公学监督，最先由复旦学生提议，后来得到了江督端方的同意。这个结果实际是众望所归，反映了复旦学生的诉求，也得到官方的支持，像端方在《筹复复旦公学经费折》中对严复的夸奖，“有候补道严复，淹贯中西，学识闳达，已派充该公学监督，管理教授，一切由其主持。”²⁶

至于严复正式接任复旦公学监督的时间，《严复年谱》说是1906年11月29日复旦学生恳求严复为校长之时，²⁷不过，这样的说法有问题，请求为监督并不一定马上能当监督，还需要官方的任命函。²⁸但是，我们从相关材料中可以考证出来严复正式接任监督的时间。如在1907年1月21日（光绪三十二年腊月初八日）写给何纫兰的信中，严复还没有提及复旦校长的任命一事，但在1907年1月30日（光绪三十二年腊月十七日）写给何纫兰的信札中，严复就言“复旦校长，南帅照会已到。”²⁹故此，严复正式被端方任命为复旦公学监督的时间就应该在这九天之内，尽管之前

²⁴ 《与甥女何纫兰书》（五）（1906年11月29日），《严复集》（第3册），第830页。

²⁵ 该广告见《中外日报》1907年2月20日，论前广告第一版；《时报》1907年2月20日，第一张广告版。

²⁶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第1009页；《复旦大学志》（第1卷），第79页。

²⁷ 《严复年谱》，第292页。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严复担任监督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约1906年3月），根据我们上引材料，此记载明显为误，或许是档案编者误记，因该档案是在1937年所编。参看《历任教职员一览表》，第1页。

²⁸ 当时的复旦虽然名为私立，但早已接受两江总督周馥的资助，周馥应旧交马相伯之请求，把吴淞旧镇署划拨给复旦做校舍，并汇两万两银子给复旦做办学经费。（参看马相伯：《从震旦到复旦》，收入《复旦大学志》第1卷，第43页。）周馥的支持对于水深火热中的复旦固然是雪中送炭，但由此也把复旦置于官方的影响之下，这时的私立复旦实际正在官办化；后来端方插手后，复旦监督更要由官方任命才得承认。时议对此也有批评，“必赖官场为赞助，甚不可解，得毋为经济之故乎？”见吼：《忠告震旦学生》，原刊《大陆报》第3年第3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评论”，已收入《复旦大学百年志》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志》（上卷），第14页。

²⁹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严复集》（第3册），第834页。此“照会”为《江督照会严又陵观察为复旦公学监督文》，刊载于《江宁学务杂志》丁未年三月十五日（1907年4月27日）第1册，“公牒”，第1-2页。其内容如下：“为照会事，照得泰东西之立学、教育与管理并重。论者谓教育为学界之母，

严复已经以复旦监督身份接受了瑞澂的拨款。农历春节过后，严复就在《中外日报》、《时报》上同时发表任职声明——《几道启事》。该启事主要说的是严复接任复旦公学监督的原因：

启者，不佞近承复旦全体公举，并两江端制军檄派为复旦公学校长，辞不获命，实惧弗胜，但当勉竭鄙诚，以副期待。尚望知爱诸公有以匡助之耳。谨白。³⁰

既被“公举”，又被“檄派”，在此情形下，严复正式就任复旦监督。有了新校长，复旦公学也马上在报纸上打出了“复旦公学增额招考广告”，³¹广告中表示，该校要“添借宿舍，增额二十名，招补旧额十名，共招插班生三十名。”并欢迎学子前来报名处报名，其中严复住处新垃圾桥北康里严公馆即为一个报名处。这次招生大概比较顺利，居然招到 40 个人，复旦公学将这 40 人名字登报备案，并要求他们于本月二十七日（农历）开学以前到校报到。³²

随学生的增多，复旦的经费困难与校舍紧张程度日益加剧，严复深切感到“复旦事难办”，决意再赴南京与端方交涉，“须与端督院破脑决断，若不起校舍，吾亦不能办也。”³³端方既然已经许诺严复在先，加之先前叶仲裕等人的禀请，就向清廷上奏折，请批准每月拨给此时有 175 名学生的复旦公学银 1400 两，“作正开销。”³⁴在获得了常经费支持的承诺后，严复信心大增，决心好好管理复旦公学，“为之整顿吴淞复旦公学”，以不辜负端方期望。³⁵

严复这时还兼任安庆安徽高等学堂的监督，由于其本人长期吸食鸦片，³⁶很难兼顾相隔如此之

而管理得人又为教育之后盾。上海复旦公学规模宏远，执事以科学大师总持教务，学子莘莘，将有一日千里之效。惟是校长，名称取义稍狭，未足缩榘全体。夙谄执事深通各学，界说谨严，其于全校规则，有应变通厘定，以及纾筹经济，扩张器物，不系教育一部分，而属之管理范围者。执事或逊让弗居教务，即美犹有憾用，特加具聘牒，敬延执事为复旦公学监督，凡全校教育暨管理事宜，悉归主持，并饬财政局刊刻关防，备文资送开用，以昭慎重，将见振裘，挈领组织，日底于完全，祭海先河，中外皆奉为矩矱。除行财政局遵照外，为此合行照会。谨请查照，须知照会者。”可惜的是这则照会并没有注明颁发的确切日期。

³⁰ 该启事最初登在《中外日报》1907年2月20日，论前广告第一版；同期《时报》也有该启事。此则材料，《严复集》以及《〈严复集〉补编》，皆未予收录。

³¹ 《中外日报》1907年2月20日，论前广告第一版；该广告又见同期《时报》。

³² 《复旦公学录取新生案》，《中外日报》1907年3月8日，论前广告第一版。

³³ 《与夫人朱明丽书》（六）（1907年4月8日），《严复集》（第3册），第737页。

³⁴ 参看端方：《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折》，《端忠敏公奏稿》，第1007—1009页。

³⁵ 《与曹典球书》（八）（1907年5月6日），《严复集》（第3册），第572页。

³⁶ 严复从1890年起就开始吸鸦片，这种情况可从他写给其夫人朱明丽的信中明显看出来，当然他给别人的信中也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他吸食鸦片上瘾的情况。严复抽鸦片的事，当时即曾受到安徽高等学堂学生的指责，“统计（严复）三学期用银万两余，在堂仅两月。而两月在堂，又高拱深宫，学生欲一睹容颜、一闻声欬而不可得，秘密踪迹之惟烟缕缕，自户出，香气扑鼻端而已。”（安徽高等学堂全体学生：《对于严监督之公愤书》，《南方报》1907年6月2日，第一页。）严复后来还遭到时人（可能也是出自安徽高等学堂的学生）很刻薄的挖苦：“侯官大士，船政学生，自称宾塞门徒，又见子陵再世。改良物质，全凭莺粟三钱；淘汰天然，空逐槐花五次。呜呼！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如是等众生、渺渺烟魂，乘此良宵，来受甘露味。”参看《新焰口经·严几道》，见《安徽白话报》戊申第3期，戊申

远的两个学校；加上严复名望日隆，又比较热衷官场事务，杂事繁多，使之在处理校务方面是左右支拙。在此情况下，严复不得不寻求代理人，来代替自己处理两校的日常事务，以减轻自己的负担。在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他使用的是追随他多年的亲信兼同乡周献琛。在复旦他使用的则是其一干亲属，如严复曾推荐其岳父（即朱明丽父亲）担任复旦文案，“月薪约五十元，不知汝爸爸肯就否？”³⁷朱父担任文案（书记）后，月薪又增至六十元。严复的妹夫何心川（即何纫兰之父）早于严复任职复旦，担任斋务长，³⁸严复任监督后，由其代表严复视事，并负责复旦的招生工作。何又引其亲戚某任杂务，月薪五十元。何也认真履行嘱托，不定期向严复汇报复旦校内情况：“本日汝父有信与我言复旦事。”³⁹

严复如此任人唯亲和遥控两校的结果，导致了严复最终在两校都遭到学生的不满与驱逐，且招致时论不少的批评。下面主要讨论严复就任复旦公学监督后及被迫离任的情况，特别是他与复旦职工叶仲裕、张桂辛发生的冲突，而正是这个冲突，造成了严复的辞职，双方高开低走，不欢而散。⁴⁰

二 冲突

复旦的脱离震旦，马相伯自然是当仁不让的领导者，然而这背后一批爱校学生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就包括深受马相伯器重的震旦学生叶仲裕，复旦之成立，他和于右任出力最多。⁴¹复旦正式立校后，鉴于校舍与经费紧张，时为庶务长的校董袁观澜（希涛）遂在《南方报》上刊出《复旦公学广告》：

本公学于夏间禀借吴淞提辕先行开校，屋少不足容来学之众，地复潮湿，校外借寄书社七处，益形散漫，于卫生、管理二者多所妨碍。现拟就炮台湾拨定地亩，赶筑校舍，一俟落成，即当改定章程，召集生徒来校就学。其提辕借设之校，明年暂不开课，特此广告。⁴²

假若照广告所言，复旦暂停招生，这对于刚创办的新学校来说，不啻是自掘坟墓，不仅不孚外来

年九月下旬（约1908年10月）。

³⁷ 《与夫人朱明丽书》（六）（1907年4月8日），《严复集》（第3册），第737页。

³⁸ 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历任教职员一览表》第8页有何心川（字镜波）为斋务长的记录，说他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1906年1—2月间）到校，福建闽侯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当然，何任复旦斋务长也可能系出自校董严复的推荐。

³⁹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834页。

⁴⁰ 关于严复与安徽高等学堂的关系，可参看沈寂：《严复为安徽高等学堂的“礼聘”与“辞馆”》，《安徽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第102-105、68页；沈寂：《严复在安徽高等学堂》，《安庆文史资料》（第28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100-105页；沈寂：《严复办学试点的成功与教训——安徽高等学堂》，《近代中国》第15辑，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第101-141页；孙应祥：《严复年谱》，第303—307页；等等。对于该事件，笔者也有新材料发现，拟另文讨论。

⁴¹ 参看复旦大学同学会：《相伯夫子与复旦》（该文原载《复旦同学会刊》，1939年3月号），转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第53—54页；参看《马相伯年谱》，第215页；又可参看《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民国纪元前七年（1905）（正月至八月）》，台北：中华民国国史馆，1987，第687页。

⁴² 《南方报》1906年1月13日等期，第一页告白。

学子之期望，亦大伤害从震旦以来一直追随的学生，还会影响及复旦的“形象”。更何况该广告所言事出突然，不符合复旦本来立校之计划。因之，该广告立即遭到以叶仲裕为首的师生们的大力反对（叶此时大概为复旦学长，角色或类似后来的学生会主席），他们马上质询校董，查明事实真相，分别以叶仲裕与复旦留校学生名义发出广告，谴责袁氏这种擅作主张之行为，并希望想要负笈复旦的学子不受其迷惑和误导。其中以叶名义所发的《复旦同学诸君公鉴》启事言：

报登公学明年不开课云云，其中另有枝节。校董不会议，校长不在沪，学生毫不与闻，谓可独断停学，景莱不才，窃未明公理何在？现竭力禀商各校董，妥筹一切。愿我远近同学，毋遽惶惑。叶景莱敬白。⁴³

以复旦留校学生名义所发启事为《袁观澜先生鉴》：

昨报告白，复旦明年听课云云，殊深骇异。走询校董，皆不知为谁主持。往谒少卿先生，则云稿由先生拟就送登。学生等劳燕分飞，甫有生趣，忽又丁此意外波折，先生素号热心教育、深明事理之人，而忍出此？除商各校董作正当之交涉外，并请莅临开示一切。同深叩禱。复旦留校学生公启。⁴⁴

旋即，《南方报》上出现了以复旦公学名义发出的《启事》，附在叶景莱的《复旦同学诸君公鉴》旁边，启事表明复旦还是会正常开学，并在筹建新校舍：

本公学明年照常开学，并即行筹画建筑新校，敬此布告。复旦公学启。⁴⁵

在与袁的较量中，以叶仲裕为代表的主张维持复旦正常运作的力量最终胜出。于此事即可见叶仲裕对于复旦的爱护以及他在学生中的影响力。⁴⁶1906年夏，叶景莱还与同为学长的温州林孟沧为弥补学校办学资金不敷——亏空达“数千金”的状况，“四出号呼，为入捐助。值烈焰甚厉，景莱等触盛暑，至金陵，又至淮杨，又至清江，奔走累月。比归沪时，则面目黧黑，状若鬼薪。幸得款甚夥，校事得以不败。”⁴⁷严复能接任复旦公学监督，其中亦有叶仲裕的努力，就是他与张桂辛等人赴南京向端方申请经费，希望端方同意让严复担任监督的。

不过严复接任监督后的一些所为，特别是其任人唯亲的做法，却不能令包括叶仲裕等在内的一批老资格复旦人满意，叶仲裕大概此时开始与严复所派来的诸管理者为难。何纫兰之父何心川曾写信给时在安庆的严复“言复旦事”，要其速返回处理，所指估计就是叶仲裕带头掣肘事，“因复旦叶仲裕亦在彼捣鬼故也。”⁴⁸考虑到叶仲裕等人在复旦的影响力（也可能包括其家族背景⁴⁹），

⁴³ 《南方报》1906年1月16日等期，第一页告白。

⁴⁴ 《南方报》1906年1月16日等期，第一页告白。

⁴⁵ 《南方报》1906年1月18日等期，第一页告白。

⁴⁶ 关于叶仲裕与复旦公学，详笔者另文。

⁴⁷ 叶瀚：《叶景莱行略》（续），《神州日报》1909年11月27日，第四页。叶瀚这里的文字，也重点彰显了叶景莱为复旦公学募捐所做的贡献，“是则景莱生平之事最可叹美者也。”但叶瀚这里回避了叶景莱与严复间发生的齟齬。

⁴⁸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三）（1907年6月4日），《严复集》（第3册），第836页。

⁴⁹ 叶仲裕其兄叶景葵（揆初），其叔父叶瀚，均为近代文化名流，他们两人与赵尔巽、郑孝胥、陈三立、

严复决定在处理叶仲裕事件前先要得到端方的支持，“以复旦公事须与端午桥扎实交代，方好办理。”⁵⁰严复还准备到南京后，将详细情况报告给端方，若是端方不同意自己的处理办法，便辞去复旦监督，严复并要何纫兰把这个意思转告其父何心川，“吾到南京，必将种种情节告知端方，若意思不对，便亦辞去不办。此意可告汝父知之。”⁵¹严复到了南京之后，初见端方，并未言及复旦事，他打算等考试完出洋留美学生后再告诉端方，“复旦情节尚未与言，准俟考后提及。”⁵²随即，在与端方谈过复旦事后，严复原本的计划似乎没有得到端方的支持，否则严复就不会拿辞职说事，然而辞职遭到端方拒绝，严复无奈，只得继续留任，履行监督职责，“复旦事力辞不脱，已电汝父，令赶紧登报招生矣。”⁵³旋即在1907年7月15日，《神州日报》等上海各报就刊出了“复旦公学招考插班生”的广告，招生限额四十名，年龄十八岁以上二十四岁以下男青年皆可来投考，七月一日、二日（即1907年8月9日、10日）在寰球中国学生会考试，云云。⁵⁴

到了该年末，严复与叶仲裕等人的矛盾日益加剧，严复认为庶务长叶仲裕私挪公款三千元，⁵⁵而庶务张桂辛管帐无方，导致学校亏空达五六千元之多，使学校的日常运行出现问题。在此情况下，严复当面向端方提出辞职，可没有得到端方同意。回到上海后，严复决定好好管理复旦，出重手惩治叶仲裕、张桂辛。他向江督端方写信揭发两人，表示了自己处理两人的举措：

复旦公学，蒙月饷二千饼金，加以诸生百五六十人之学费，期六十元，义旧有募款，若综覈撙节经用，即有不敷，当亦为恨〔有限〕。乃本年岁暮，尽〔竟〕亏短至于五六千金之多，此其故有二：一则学生短缴学费，两学期计三千五六百元；一则庶务叶景莱借用三千元存款，至今屡催不能照缴。复为监督，原有理财用人之责，虽经费出入，向系叶、张二庶务手理，而稽察无方，致令纠纷如此，诚无所逃罪者也。但在校各教员薪水，尚有两月未领，岁事峰嵘，群怀失望，乃不获已，由复电请恩饬主者，许其探支明年发款，借苏辙鱼。顷承电准预拨正月经费二千元，感荷莫名！当即交付庶务张桂辛，属其分别缓急应用，俟羸绌如

端方等人也有较密切关系。

⁵⁰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二），《严复集》（第3册），第835页。此札未署具体日期，结合前后文推断，当写于1907年4、5月间。

⁵¹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三），第836页。

⁵²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四），《严复集》（第3册），第836页。

⁵³ 《与甥女何纫兰书》（十六）（1907年7月11日），《严复集》（第3册），第836页。

⁵⁴ 《神州日报》1907年7月15日，第一页广告版。

⁵⁵ 根据叶仲裕的当时情况以及他对严复的回应，叶挪用校款应该属实。这时叶正代替于右任主持《神州日报》，尤其是《神州日报》馆在1907年5月8日因邻居失火而被殃及后，“同人生命无恙外，所有一切悉数被毁”（“本社启事”，《神州日报》1907年5月10日，第一页广告版），报馆需钱孔亟，叶景莱“以一身独任其难，四出奔驰，艰窘万状。”（叶景葵：《鸩痛记跋》，收入顾廷龙编：《叶景葵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9页。）故此，叶庶务长挪用复旦校款是有可能而且很容易实现的。顾廷龙先生言及叶景莱主持《神州日报》时也说，“亏负甚巨，卒不振。所遇多拂逆……”（顾廷龙：《叶公揆初行状》，收入《叶景葵杂著》，第421页。）实际上，早在1906年6月20日，叶仲裕就曾托严复向郑孝胥借钱一千元，但被郑拒绝了。参看《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046页。

何。再令将本年校帐，据实造报，以重公款。但重有恩者，前在左右，已将复旦监督力辞，未蒙俯准。是明年此校乃属复经理，惟校事经费最重，倾立视之，似应由复收回存号，按月发交会计员搏壹应用，即令于月杪造销，交监督汇报，庶不致再循前此覆辙。至一切章程，亦须重新斟酌，遵照部章厘订，庶成可久之规。至叶景莱、张桂辛二人，一则延欠校款，一则造报稽延，实属都不胜任，应准由复开除，以维校政。是否有当，伏乞垂示遵循，自出不恭，不胜惶悚待命之至，敬请慈鉴。监督复谨禀。⁵⁶

严复此函所述处置办法大概是得到了端方支持，因而严复敢于采取铁腕措施，首先发难，指出复旦财政归自己亲自打理，除了旧账可以找叶仲裕、张桂辛结算外，丁未年（1907）后的帐目，就与两人无关，实际是将叶仲裕、张桂辛两人开除出复旦，且他们还必须要为以前之旧账、坏账负责。严复亦责令新老学生必须交齐各项费用后，才能入校就读，且在报上发布《复旦监督严复启事》，说明这些情况：

敬启者：今年本公学庶务、财政奉督宪谕，归鄙人督率会计员自行经理。除丁未年，以前所有帐目报销，应有叶仲裕、张桂辛两员结算外，嗣后校政与之无涉。特此声明，以清界限。谨布。再启者，本公学校费，每学期旧生应缴学费及膳宿费六十元；新生应缴六十六元；又生每学期另交号衣费五元，洗衣费三元。均须于入校前亲赴本校会计处缴足，掣取收条，各自由监学派定学舍居住。其未行缴清楚，虽经擅入，均行挥出，决不通融。特此敬布。⁵⁷

严复的做法马上受到叶仲裕、张桂辛的回应，两人当即联合在上海多个报纸上连续刊载内容相同的广告，反击严复。其中叶仲裕发表的《叶景莱启事》以列举事实的方式反驳道：

自丙午冬，景莱与张君桂辛赴宁禀请拨定复旦常经费后，又禀请延聘侯官严几道先生为监督，以冀于教授管理一切，力求进步。迨皖学风潮起，舆论所激，颇有以此举为大不然

⁵⁶ 《与端方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582—583页。《严复集》与《严复年谱》编者均将此札系年为1906年冬所书，为误。因端方实际拨给复旦常经费是在1907年春，严复1906年12月6日见端方时，还要求端方肯资助“开头及后此常经费”，才能“为彼中校长”。严复此札中“本年岁暮”、“两学期”等语，表明复旦已经收到拨款两学期，但仍然入不敷出。根据下文将引的《复旦公学学生广告》可知，复旦得到端方每月2000元的拨款是自1907年年初，至1908年1月刚好“一载于兹”共二万四千元。唯“明年此校乃属复经理”中之“乃”，似乎表明该函应为1906年岁末所写，但假若此札为1906年冬所书，则严复为何直到1907年底、1908年初才发难要开除叶、张两人？此处说到已经收到端方拨款两学期，则到1906年末时，端方甫任江督3个月，复旦断不会已经收到其两学期拨款的。而且1906年底，严复就任监督，也不会立即向请他担任复旦监督的叶、张发难。再者，根据《与端方书》（二）中严复自谓，复旦“文案则去年之监学周明经良熙改充”，而周良熙至少在1907年5月底安徽高等学堂发生风潮之前，一直在该校担任“杂务”（参看《严复年谱》第301页），1906年年底时还不可能在复旦任职，所以应该是在1907年5月底安徽高等学堂发生风潮之后，严复被迫辞职，周又随严复到复旦任职。《与端方书》（二）与第一札内容关联，似可断定第一札系严复在1907年年底或1908年年初写给端方的。

⁵⁷ 《时报》1908年2月9日，第一张广告版；《中外日报》1908年2月7日，第一张广告第三版。《严复集》、《严复集》补编》皆未收录该文。

者。景萊亦因有他事滯滬三月后，校中一切即未暇過問。監督月索五百金，終歲莅校三五次，于督憲原奏、景萊等原稟中延聘專門教員諸節概不提及，而親故坐食者且紛至：其妹婿何任齋務，月修二百；何威某任雜務，修五十；又某任書記，修六十；下學期以人言嘖嘖，陸續自退。中國公學同時請款、同時請監督，監督、校員獨能力盡義務，刻苦辦事。以彼例此，時深痛心間。秋，督委員夏觀察至滬，曾力陳節省持久辦法。冬間，復赴寧面請督憲委胡君子請來校整理。數年來，委曲求全，原為復旦全局着想，不意監督乃有此先發之舉也。啟事云云，于情理為未合，除另行交涉外，先此廣告，敬希公鑒。再此事由景萊自行交涉，遠近同學請照常莅校，勿多疑阻，以全大局為幸，并白。⁵⁸

張桂辛發表的《張桂辛啟事》亦言：

敬啟者：復旦公學自桂辛與葉君歷經困難，保存成立。丙午冬，請端督憲聘嚴幼陵先生為監督。一年以來，種種為難，故于去臘立意告辭。原俟今正將經手事件匯具報銷，一面登報聲明。乃昨見嚴監督啟事，殊為詫異。除另將詳情布告及詢明意見外，特先聲明。⁵⁹

兩則啟事尤其是《葉景萊啟事》，將嚴復敗走安徽的情況，嚴復任復旦監督的原因及之后的舉措，甚至是嚴復親屬的姓氏與所擔任的復旦公學職務，乃至自己採取的應對措施一一公布，並將復旦和同時獲得端方資助的中國公學作對比，⁶⁰以此凸顯監督嚴復的不稱職。葉景萊還特別點出奧援——“遠近同學”，來警告嚴復。

嚴復立即看到了葉、張的啟事，不為所動，馬上也在報紙上刊出《嚴復啟事》回擊，祭出更強大奧援——“督憲”，並發出最後通牒：

昨閱葉君景萊、張君桂辛兩啟，為之恍然。葉君所言尤與事實大有徑庭，姑不與辯。但兩君所未明者，丙午以前復旦公學雖賴眾擎之舉，尚為私立之校。自丁未春，經兩江督憲奏撥常年經費、派定監督之后，已成官立之校。今昔性質瞭然不同，夫豈吾黨所能盤踞？校款挪欠，迄無報銷，不佞責無旁貸，故嘗于客歲五月、臘月親謁督憲，一再力辭，不行不獲命，是以決計本年將校政大加改良，駐校親督。前者劃清界限之啟，乃至不得已而開罪于朋友。總之，此事解決不出兩途，如兩君自謂有永遠管理此校特權，即煩具稟請撤監督，則校事從

⁵⁸ 《神州日報》1908年2月9日，第一頁廣告版；《申報》1908年2月10日，第一張第一版；《時報》1908年2月10日，第一張廣告版；《中外日報》1908年2月10日，第一張廣告第一版。

⁵⁹ 《神州日報》1908年2月9日，第一頁廣告版；《申報》1908年2月10日，第一張第一版；《時報》1908年2月10日，第一張廣告版；《中外日報》1908年2月10日，第一張廣告第一版。

⁶⁰ 此时的中國公學監督是由端方委任的鄭孝胥，“查有候補四品京堂鄭孝胥……已照會為該公學監督，主持一切。”《江督籌撥中國公學常年經費折》，《神州日報》1907年7月21日，第三頁；該折又被收入《江寧學務雜誌》第5期（丁未年七月十五日），“公牒”，第3-5頁；还被收入《端忠敏公奏稿》，第1010—1013頁。鄭孝胥于1908年3月24日曾“致中國公學書，報告辭退監督”，端方還想讓鄭繼續任監督，但鄭志不在此。參看《鄭孝胥日記》（第2冊），第1134、1136頁。實際上，很快，在1908年9—10月間，夏敬觀任監督時，中國公學也發生了大規模風潮，絕大多數學生退學而另立了“中國新公學”，時在中國公學求學的胡適就是其中的積極參與者。

此与复无关。若犹是不佞而为监督也，则前者吾启固一字不可动也。至于交涉风潮，固前知其如此矣！诘何为者。谨布。⁶¹

从上面这则启事里严复对叶、张的反批评可以看出，严复对叶仲裕关于他很少到校视事以及任人唯亲的批评并没有当即反驳，尽管这其中确有冤枉严复之处，如其妹夫何心川任斋务长是在严复入校任监督之前。严复在启事里还自白，说自己于去年五月、腊月（约在 1907 年 7 月、1908 年 1 月）两次向端方请辞复旦监督，但都没有得到允许，于是才下定决心整顿复旦。在这里，严复重点针对叶仲裕，抓住叶挪用校款事做文章，并抬出“官办”和“督宪”作为尚方宝剑，表明自己并不畏惧学潮，企图迫使叶就范。

张桂辛看了严复这则启事后，马上在报上发表了《张桂辛启事》，来反驳严复，并表示叶仲裕暂时不在上海，他返回后定会有所回击：

阅严幼陵先生第二次启事，有所未明，谓官立、私立今昔大殊，求之事实，容有未合。且以告辞，何云盘踞？现叶君旅行数日，即当返沪，俟叶返时当再分别剖白，以质诸公论。⁶²

不仅如此，或许是出自学生自发的组织，或许是出自叶、张的鼓动，面对叶、张庶务与严监督之争，一个以复旦公学学生为名义的《复旦公学学生广告》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

复旦自与震旦分校后，当事者竭力组织，始底于成。嗣以风潮叠兴，方知众擎之不可久恃。意侯官为东南巨子，故奉为我校监督，乃一载于兹，于教育规则不独未尝过问，且淹留沪上，月享厚薪，而又荫及戚友，官款二万四千元，浸润于监督及其戚友者达半数，其裨益于我校者未之或问。同人为全校计、为学界计，既不愿阻我校之前途，尤不愿以扰乱秩序之风贻讥当世，故忍气吞声，迄于今日，然犹望监督之或图振作也。乃监督不独与众望相违，反以官办二字之徽号宠锡我校，我校何幸得此？但不知我校之受官款津贴者，其体制为何如耳？同人因阅逐日告白，奔走来沪，谨举大概情形，质诸海内外士大夫鉴而查之。远道诸公学，如有函件，仍寄本校可也。复旦公学学生谨启。⁶³

从该广告看出，一部分学生并不愿意承认复旦为“官办”学校，尽管复旦事实上已经接受了官方津贴，若是没有这些津贴，“私立”复旦公学可能早已关门大吉。⁶⁴另外，这些学生耿耿于怀的仍

⁶¹ 《时报》1908 年 2 月 12 日，第一张广告版；《中外日报》1908 年 2 月 12 日，第一张广告第一版。此则材料，《严复集》、《〈严复集〉补编》等亦皆未收录，研究者也未利用到。

⁶² 《神州日报》1908 年 2 月 13 日，第一张；《时报》1908 年 2 月 14 日，第一张广告版；《中外日报》1908 年 2 月 13 日，第一张广告第一版。

⁶³ 《神州日报》1908 年 2 月 17 日，第一页广告版；《时报》1908 年 2 月 17 日，第一张广告版。《中外日报》1908 年 2 月 17 日，第一张广告第一版。该广告的《神州日报》版把“复旦自与”误作为“复相自与”，《神州日报》后来再刊载此广告即纠正了。

⁶⁴ 后来中国公学亦曾面对相似的情形。1908 年 11 月 17 日，中国新公学诸人来找郑孝胥，“言公立之中国公学不应改为官立事。”郑孝胥立即从官方立场驳斥之：“如学生能自筹费，不借捐款、官款则可；今‘公立’二字久已卖却，复何言乎？”见《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166 页。

是严复在监督任上的不尽职、不负责，任人唯亲。该启事还反话正说，“不愿以扰乱秩序之风貽讥当世”，实际是暗示当局如果不赶走严监督，就可能会酿成使当道头疼的学潮，而奔走来沪的同人即是证明。

至此，复旦的学生也开始介入这个冲突，并发挥了极大的象征效力，复旦内部的校长与教工矛盾开始剧烈化和公开化。在当时学风乖戾的环境下，身为监督的严复处境开始不利，尽管他最初拥有来自端方的支持，可一旦酿成学潮，很难保证严复会继续得到官方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在前不久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时已经引发了学潮情况下。有趣的是，1907年4月安庆安徽高等学堂的罢学风波，其焦点所在，也是严复的任人唯亲和尸位素餐，“实以监督遥制，任用非人，糜费过多，取予恣意，学科不备，卒业无期……”⁶⁵“监督任事两年，住堂不过两月，共糜修金两万”，又“约记开销，闽籍教员款项每岁不下二万左右。”⁶⁶

在这则《复旦公学学生广告》发布后不久，大概一直在暗中运作此事的叶仲裕又发出《叶景莱启事》，表明叶、张与严复之争已经告一段落，江督业已派员来处理复旦内部纠纷：

侯官先生及景莱等广告诸节，已有江督委毛学究、夏观察来沪理一切，可付诸公论。

诸同学务即照常莅校上课。至关于复旦全局诸事，景莱仍当力持正论，断不谗卸。远近来函，恕不一一奉复。⁶⁷

从这个启事可以知道，复旦的此次风波所关颇大，致使江督端方不得不派提学使毛庆蕃、候补道夏敬观来斡旋叶、严之争，复旦学生也曾一度没有正常到校上课。而一句“至关于复旦全局诸事，景莱仍当力持正论，断不谗卸”，则表明严复开除叶景莱的计划没有获得成功。

三 辞职

以上三则启事发表后，严复与叶、张及复旦学生之间想必还有许多博弈，可惜限于材料的匮乏，其具体情况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此后一段时间（1908年3—4月）里，严复依然不断到吴淞复旦办公，还在农历二月十一日（1908年3月13日），收到复旦所给该年第一月的薪水。饶是如此，身为复旦公学监督的严复没能成功开除“眼中钉”叶仲裕，这就意味着严复的失败。事实上，对于张、叶的第二次启事和《复旦公学学生广告》中的批评，严复都没有再做公开回应，这对于一向爱惜羽毛的严复来说，颇不寻常。稍早他在辞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时，曾发表洋洋长论《辞退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意见书》，⁶⁸反驳学堂学生与时论（主要是《南方报》、《神州日报》）对他的批评。而对于他与叶仲裕的纷争，严复只是在给友人的信中略作说明和辩白：

⁶⁵ 《皖省高等学堂风潮续志》，《南方报》1907年6月10日，第三页；参看《皖省各学堂教员为高等学堂事上学使禀》，《时报》1907年6月9日，第四页。

⁶⁶ 《续志高等风潮之原因》，《神州日报》1907年5月30日，第四页。

⁶⁷ 《时报》1908年2月23日，第一张广告版；《神州日报》1908年2月23日，第一页广告版。

⁶⁸ 该文也发表在1907年6月24、25、26日《中外日报》上（皆在第三张第二版），题为《严几道辞退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意见书》。《严复年谱》只提及该文曾发表在《直隶教育杂志》（丁未年第8期，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第121-128页）上，没有发现其亦发表在《中外日报》上。

复缘复旦学校事，大为叶仲裕所撼。自开学以来，极力怂煽旧生与不佞反对。而远道学子则来者日多，校舍添咽，至无以容。私念衰老之人乃与顷领小儿讨论短长，真为可笑。⁶⁹ 严复此函认为是叶仲裕挑动复旦老生来反对他，他这里虽自白不愿意与“顷领小儿”（即指叶仲裕等人）计较，但其自视甚高、愤愤不平之意却展现无疑。实际上不是严复不屑与叶仲裕计较，而是在与叶的较量中他已经处于下风，再这样下去很可能是得不偿失、自取其辱，故才决心以辞职了事。严复在稍后（约 1908 年 4 月）模仿韩愈《答柳柳州食虾蟆》诗之志趣，⁷⁰写下的三首绝句也可表明这点，当然这诗中不乏自我解嘲与反悔当初接任复旦监督之意：

桃李端须著意栽，饱闻强国视人才。而今学校多蛙蛤，凭仗何人与洒灰？

瓶水才添起小澜，爬沙手脚恣盘桓。通宵鸣唤知何意，且说盆池不属官。

龙雀东南白虎西，从渠吞月罪应齐。吴烹卤馔吾何择？不更攒眉吃水鸡。⁷¹

凑巧的是，直隶总督杨士骧恰巧在这时给了他一个待遇较优厚的职位，“适昨者北洋莲府尚书有信相招，则电请南洋派员接理。”⁷²严复决定不再恋栈，于 3 月 23 日（或 24 日）正式请示端方（“电请南洋”），辞去复旦公学监督职位。但他总需要向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江督端方交代一下复旦现在的办学情况，更重要的是，需要向端方解释一下自己在任复旦监督时并没有任人唯亲，自己亦是尽职尽责，并非像叶仲裕等人所批评的那样：

刻该公学自开课以来，诸〈事〉尚称就绪。内地各处学生，来者日多，达二百余未已，皆以校舍已满，无从收录。刻以二百人为额，分为七班，循序渐进。深知校费为难，故亦未敢稟请完派斋庶诸长，于干事仅设三员：一监学，一会计，一文案。藉资助理。而监学系严教员兼充，会计系教员张汝辑兼充，文案则去年之监学周明经良熙改充。月各给薪五十元，为撙节之地。

复仍隔日到校一次，监视巡阅，但今有下情须向钧座沥稟者，复以望六之年，精神茶短，加以气体素羸，风雨往来，肺喘时作，实万万不胜监督之任，应请我宪早日派人接理，常川

⁶⁹ 《与熊季贞书》（八）（1908 年 3 月 24 日），《〈严复集〉补编》，第 279—280 页。

⁷⁰ 韩愈《答柳柳州食虾蟆》诗有教育虾蟆犹如对牛弹琴之意，虾蟆非但不感恩图报，反作跳梁小丑，让人不堪，不过长期下去，教育者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明智的人最好独善其身。该诗颇长，此处不录，可参看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91 年，第 106—107 页。

⁷¹ 《三月自吴淞复旦学堂还寓，因忆昌黎〈食虾蟆〉诸诗，不觉大笑，戏成三绝句》，《严复集》（第 2 册），第 366 页。此诗可能严复系三月初一日所写，据郑孝胥记载，严复曾于 1908 年 4 月 2 日（即农历三月初二）寄此时身在南京的郑孝胥诗一首，此“诗”很可能就是严复的仿韩愈《食虾蟆》诸诗，郑当时“即答之”。参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136 页。笔者翻检郑孝胥的《海藏楼诗集》，没有发现可以与严复仿韩愈《食虾蟆》诸诗旨意相近的诗句。但以上只为笔者推测，尚须进一步的资料挖掘，才能确定严复、郑孝胥此时唱和的诸诗之具体为何及其写作时间。

⁷² 参看《与熊季贞书》（八）（1908 年 3 月 24 日），《〈严复集〉补编》，第 280 页；据后来严复自承，此职位为“新政顾问官”，月薪 300 元，车马费 200 元。参看《与夫人朱明丽书》（十二）（1908 年 9 月 2 日），《严复集》（第 3 册），第 741 页。

驻校，庶校政不至放纷，上辜煦植人才至意。前者夏道敬观到校察看，复已属其将此情形上达钧听，兹郑廉访赴宁，更求其剴切代陈。务望仰体下情，弛其负担，俾得免于罪戾，不胜激切屏营之至。⁷³

严复此札展示了很多东西，也掩饰了很多东西。复旦招生增多，经费益形困难，这固然是现实问题。严复还说因为节约经费，监学由严教员兼任，文案由周良熙担任，⁷⁴这就有些欲盖弥彰！其实这种情况只是在1908年1月后才发生，之前则多是严复一干亲属在管事，严复很少到校视事。⁷⁵至于严复隔日到校一次的情况，则是在他和叶仲裕、张桂辛发生冲突——叶、张包括一些学生批评严复到校视事次数不多、没有恪尽职守之后。当然，严复这里说他身体衰弱、不胜监督之苦虽然是借口，但也有部分实情，像他在和郑孝胥的诗句中所自白，“水中盐味饮方知”，“老夫真欲把降旗”。⁷⁶

进而，严复担心端方因为找不到接任复旦公学监督的合适人选而不准自己辞职，还专门附信向端方推荐接任监督的合适人选：

复旦监督一席，若一时难得其人，许复举贤自代，则窃意夏道敬观与此校交涉凡三四次，于其中办理情形极称熟悉，其人亦精明廉干，似可派充。若我宪必求精通西学之人，则复忆去年学部秋试，所得最优等游学美国专门教育之两进士，一熊崇志，一卞富灼，皆广州人，

⁷³ 《与端方书》（二），《严复集》（第3册），第583页。《严复集》编者将此札系年为1907年上半年所书，明显为误。严复该札附函有“去年学部秋试”句，查《严复年谱》，严复参加学部秋试1907年10月初，且周良熙任职复旦也至少在1907年6月后。该札中还提及夏敬观（即叶景莱启事中的夏观察）来复旦查看事，故此札当写于严复与叶仲裕冲突、夏敬观到校视察后，其日期应该在1908年3月初之后（据郑孝胥记载，夏敬观3月7日在上海曾拜访郑孝胥，参看《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132页）。严复文中所提“郑廉访”，是端方手下红人、严复好友郑孝胥。查郑孝胥的记载可知，郑孝胥是3月23日坐船赴南京见端方的（《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1134页），他在南京还遇到夏敬观，则此札当在这之后，在4月16日前。如严复在1908年4月16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写给熊季贞的信中所言，“兄尽此月内，计当北上。然颇舍不得南中诸友。”（《与熊季贞书》（九），《严复集》补编，第280页。）上述材料表明，严复本计划农历三月即交卸复旦公学监督职务。

⁷⁴ 严复这里说的“严教员”，是浙江余姚的严鹤龄，他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约1908年2月）开始担任监学，1908年8月考取浙江官费留美法科，同时考取官费留美者还有翁文灏等20人（参看《浙江考试留学生揭晓》，《神州日报》1908年8月13日，第3页）；周良熙开始担任文案也是在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只有张汝辑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八月（约1906年9月）入校的。参看《历任教职员一览表》，第6、14页。

⁷⁵ 当时复旦学生的后来回忆也可证实这种情况：“严虽长母校，但因兼长安大，不能时常到校，特委何某（名字记忆不清）常川住校，主持校务。……严校长因不能时常到校，校务不免废弛，各方表示不满，即引退，从不与学员为义气之争，相持不下，致危及校本者。”薛祐宸：《母校吴淞时代之回忆》，见薛明扬、杨家润主编：《复旦杂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20-21页。

⁷⁶ 《答郑太夷》，《严复集》（第2册），第366页。原诗未署时间，但《严复集》编者将此诗列于严复仿韩愈《食虾蟆》诸诗之后。笔者推测，此诗应该是严复作于仿韩愈《食虾蟆》诸诗后不久，大概是严复对郑孝胥和诗的和诗。

于教育一道实有心得。现经邮部指调差遣，用违其长，未免可惜，若调其一，使之接理，必能胜任愉快。复一为自卸责任，二为学堂发达起见，故敢沥诚布恳，伏乞照察。⁷⁷

可能是端方觉得严复眼高手低，缺乏解决实际事务的能力，更可能是端方的确在为严复着想，考虑了严复在复旦的尴尬处境，终于答应严复辞职的请求，任命由严复推荐的夏敬观（1875—1953）接任复旦公学监督。至此严复担任复旦公学监督的时间正式结束。这在严复写给熊季贞的信里也有所显示，“复本计三四月北游燕赵。嗣以复旦候建成（即剑成、剑丞，夏敬观的字）交代，交代后有江宁之行，及归，天时已酷热。”⁷⁸从严复此言可知，严复移交监督给夏敬观约在公历 1908 年 5 月左右。这个时间也与复旦大学的档案记载相吻合。⁷⁹从 1906 年年末，到 1908 年 5 月，严复任复旦监督总计约一年半的时间。⁸⁰在这段时间里，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竺可桢、陈寅恪、梅光迪（1890—1945）、钱智修（1883—1948）等人都正在复旦公学求学。⁸¹移交之后，在 1908 年 6 月 5 日，严复还去南京拜会了端方，6 月 9 日返回上海。⁸²端方应该会对严复有所慰留，还可能让严复继续领有拿钱不干活的薪水每月三百两。⁸³严复在待遇上应该不会感到失落。⁸⁴

⁷⁷ 《与端方书》（二），《严复集》（第 3 册），第 584 页。

⁷⁸ 《与熊季贞书》（十）（1908 年 8 月 1 日），《〈严复集〉补编》，第 281 页。

⁷⁹ 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说夏敬观入校任监督时间为光绪三十四年四月——约 1908 年 5 月，参看《历任教职员一览表》，第 1 页。另根据郑孝胥记载，夏敬观至少 5 月 8 日就在上海了，而郑于 4 月 28 日在南京还见到过夏，参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141、1139 页。不过 4 月 20 日，郑孝胥在上海也见到过夏敬观，这时夏可能是去接替郑孝胥的中国公学监督一职，交接完毕后因带中国公学学生旅游兼去南京拜见端方旋即返宁（参看《中国公学旅行详志》，《神州日报》1908 年 5 月 4 日，第三页）。《夏敬观年谱》说夏于 1908 年 6 月接任复旦监督，未知何据。参看陈谊：《夏敬观年谱》，黄山：黄山书社，2007 年，第 32 页。

⁸⁰ 《马相伯年谱》言：“严又陵先生长复旦公学，未一年即辞去。”参看《马相伯年谱》，第 218 页。此判断为误，《复旦百年志》编者也将严复任复旦监督时间误以为是在 1906—1907 年。

⁸¹ 参看复旦大学档案馆馆藏：《复旦公学考试等第名册》，目录号 ZH0101—2，案卷号 2，第 7、8、12 页。据名册可知，此时陈、竺、钱在丁班，陈考试成绩九十四分二，竺为八十六分六，钱为七十七分九；梅在庚班，考试成绩为八十九分八。

⁸² 据《郑孝胥日记》1908 年 6 月 5 日记载：“坐午正快车赴南京，遇严又陵。七点半，至下关，同入城至中西旅馆。……遂谒午帅（端方）。”次日端方还宴请了严复、郑孝胥等人。由郑日记可知，严复是该日与郑孝胥结伴到的南京，并一起拜见了端方，可惜郑孝胥这里并没有提及严复与端方的谈话内容；6 月 9 日返回上海时，郑恰巧又与严复同车。参看《郑孝胥日记》（第 2 册），第 1144 页。

⁸³ 参看《严复集》（第 5 册），第 1483、1486 页。

⁸⁴ 端方这时还为严复出头，上奏朝廷请赏给严复进士出身，可见他对严复的欣赏。唯《严复年谱》并未提及此事，笔者是查别的资料发现的。参看端方：《江督端奏选用道严复请赏给进士出身折》，《四川教育官报》戊申第七册，光绪三十四年七月（约 1908 年 8 月）；需要说明的是，该折亦未被收入《端忠敏公奏稿》。补充一点，直到 1910 年 1 月 17 日，严复才被赏给“文科进士”，一了其想拥有正途出身之夙愿——严复“平生以未预科第为耻，此后虽奋发治八比，终于报罢，以积劳为道员……”参看：《严复集》（第 5 册），第 1503 页；赵叔庸：《严几道》，《古今》半月刊第 38 期，1944 年 1 月 1 日，第 7 页。

当请辞复旦公学监督时，严复私下向朋友称，一部分学生对之进行了挽留，“不意诸生闻之，又群起挽留，电宁请勿去。进退殊不自由，大苦。”⁸⁵这样的说法未必属实，很可能是严复在朋友那里的自我挽回颜面之举。

之后，严复与复旦的缘份还没有完全结束，在1908年8月12日，严复致函伍光建，讲述夏敬观请代为推荐复旦算学教习事，问伍能否帮忙，“顷复旦监督夏剑成观察来言：该校算学教习周益卿因病辞馆，一时难得好手弥缝其阙，嘱复寻人，复实无以应之，盖益卿造诣甚深，欲得同等地位人固甚难也。因问尊处夹袋中有如此人否？恳复奉询左右，祈即回信。夏观察于该校维持之意甚殷，惜有贝无贝二者皆甚困难缺乏，据拮可怜。稍能助之，亦一盛德事耳。”⁸⁶严复在任复旦公学监督的时间虽难称愉快，可他并没有记挂前嫌，依旧愿为复旦帮忙，并对夏敬观的努力表示佩服，希望伍光建也能为解决复旦的困难出些力气。

四 总结

平心论之，严复在担任复旦监督之前，曾为复旦做了不少工作；在正式就任监督的时间里，也为复旦做了一些事情，比如争得了端方的资助，亲自出招生的英文试题和阅卷，⁸⁷将私立复旦朝向官办化发展以获得稳定的经费来源，乃至辞职后还为复旦监督夏敬观帮忙聘请算学教习。⁸⁸但总体来说，作为复旦公学监督的严复并不太称职，正如叶仲裕及复旦学生在启事中集中抨击严复的，就是他遥控复旦、任人唯亲，又没有为复旦延聘专门教员。⁸⁹

转言之，在当时学风嚣张的情况下，学生闹事、罢学已是常态。如时人之评论，“平时居学校则以放纵为自由，以顽劣为平等，一有不合，则动以退学为挟持，以冲突为目的，致热心办学者亦有所顾忌，而整顿无从。夫今日官立之学，大抵重压制，则奴隶之教育也；私立之学堂，大抵

⁸⁵ 《与熊季贞书》（八）（1908年3月24日），《〈严复集〉补编》，第280页。

⁸⁶ 《严复集》（第3册），第585页；《严复年谱》，第323—324页。《严复集》将此函系年为1907年7月，误；应该是《严复年谱》所认为的——该函日期为1908年8月12日。

⁸⁷ 参看周越然：《追忆先师严几道》，《杂志》1945年8月号，第15卷第5期，第16页。

⁸⁸ 严复的书法给当时一些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从端方那里得到的拨款也让当时某些学生印象深刻。参看薛祐宸：《母校吴淞时代之回忆》，见薛明扬、杨家润主编：《复旦杂忆》，第20-21页。

⁸⁹ 另外，据1907年夏秋之际进入复旦求学的周越然回忆，严复执掌复旦时曾以《社会通论》当作教科书，此举也颇遭学生非议，“他（指严校长）收了我们的学费，还要译出书来骗我们的钱。可恶啊，可恶！”再者，根据周越然对严复任复旦监督时的描述，可知严复开学接见学生时派头很足，但在例行的训话会上最后并未训话，只是走走过场，其气势却让周越然念念不忘，“他出门时提了那根手杖，真是‘神气’，他圆圆的脸，微微的鬚，绸袍缎褂，瓜帽便鞋，加以随从者数人——虽然是个候补道台，但比实缺更加大方。”周越然在接下来的回忆里还认为，“先师严先生在一生中，曾经两次受冤枉。第一次是在拳乱之时……第二次是在洪宪时代……”其中并未曾提及严复在复旦受冤事。且周自谓，从在复旦开学时见过严复外，直到民国四五年，就再未曾见过严复。这除了表明在当时复旦，校长与一般学生等级差距较大之外，其实更表明严复到复旦视学次数和接见学生次数并不多，所以连非常敬仰他的学生周越然亦无从记起。参看周越然：《追忆先师严几道》，《杂志》1945年8月号，第15卷第5期，第16-18页。

主任任，则野蛮之自由也。”⁹⁰学校校长的任何举措都有可能遭到学生的杯葛，对于一个“溺职”又“引用私人”的校长来说，其行为尤易引发学生的罢学闹事现象。⁹¹严复无非是这种状况的牺牲品。无怪乎时人会对严复有这样的指责与讽刺：

严复的为人，只晓得自私自利，只享权利不尽义务。他在安庆高等学堂里面，天天抽鸦片，一个人都不会，一件事都不做，每月白白的骗五百块洋钱；还有时候住在上海，又骗用复旦学院的修金。实在是个大滑头了！⁹²

上述引文虽不免有些夸张和苛刻，可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严复同兼两校监督时的一些作法，确有招致物议之处。⁹³

同时担任两校监督，对于缺乏实际行政事务能力，又经常南来北往、身体状况欠佳的严复来说，已非力所能及，可严复并没有坚辞（后来的请辞或是被迫或是作为以退为进的策略），除了出任监督可以落实自己的教育理念等因素外，⁹⁴两校监督的较丰厚薪水应该是严复恋栈的重要考虑。像他曾不断地表白，自己妻妾、儿女众多，⁹⁵“一一皆须教养，此皆非巨款不办，真不知如何挪展耳。”⁹⁶1909年底，“北洋现已换人”，陈夔龙接替端方为直隶总督（端方在1909年6月28日接替杨士骧），严复首先担心的仍是自己的“六成薪水”。⁹⁷后来严复去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金钱考虑是很重要原因，“此来不过为些钱文。”⁹⁸知识分子做事都为稻粱谋，半是无奈、半是悲哀，国家不幸，其实“诗家”也难幸，而家累甚重的严复为五斗米折腰，又何足厚责焉！

⁹⁰ 庸：《中国前途之问题·教育问题》（四续），《神州日报》1907年5月2日，第二页。

⁹¹ 《谨告各学堂之学生》，《中外日报》1905年7月14日，第一版。

⁹² 楚元王：《谕立宪党》，载《天讨》，《民报》第12号临时增刊（1907年4月2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69年影印本《民报》，总第2066—2067页。

⁹³ 后来《民吁日报》上也载文评论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及严复继任监督后，“其中风潮叠起，走者走，而死者死。”《复旦公学之再造说》，《民吁日报》1909年11月2日，第四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69年影印本，总第240页。

⁹⁴ 严复内心的自我认同可能未必将两校“监督”当回事，出任监督（包括译书、办报等活动）只是他谋生的无奈之举，“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与张元济书》（八）（约1900年），《严复集》第3册，第537页。他渴望做“帝师”，他在不同时间曾让郑孝胥和英敛之给他写条幅——“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严复年谱》，第278、311页），他自拟的书房联语也是此联（《〈严复集〉补编》，第83页），在在可见严复之抱负与自信。

⁹⁵ 严复自谓他有二妻一妾，五子四女，其中一子早夭。参看《与熊蕤如书》（七）（1912年9月25日），《严复集》（第3册），第607页。

⁹⁶ 《与张元济书》（十八）（1905年3月1日），《严复集》（第3册），第555页。

⁹⁷ 《与夫人朱明丽书》（三十一）（1909年12月9日），《严复集》（第3册），第755页。

⁹⁸ 《与夫人朱明丽书》（三十九）（1910年4月24日），《严复集》（第3册），第760页。这话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严复的自嘲，说明他已经预先认识到在名词馆任职难有作为，只能把挣钱作为就任理由。